

目 录

中 美 关 系

美国国内对华政策辩论与中美关系未来/1 何汉理

美国基督教对华传教与民国时期中美关系/10 涂怡超

关系正常化与人文交流

——建交前后中美关于人文交流的磋商/33 毛瑞鹏

美国政治与军事

试析美国战略文化的两面性/46 顾 伟 刘曙光

集体记忆和观念主体

——对美国对华军事外交的信誉评估/60 张 芳

奥巴马政府对伊反核扩散政策遗产评介/76 陈 佳

何谓“美国例外主义”？

——一个政治术语的考察/93 王光华

美 国 经 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汇率政策的演变逻辑/112 马萧萧

试析 TPP 协议劳工标准的美国意图及对中国的影响/133 柯 静

美国社会与文化

“道歉”运动与华裔在美国的社会政治地位/151 汪舒明 李晔梦

美国与土耳其关系中的“葛兰运动”/167 何健宇

Abstracts and Key Words/183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概况/190

征稿启事/192

中美关系

美国国内对华政策辩论与 中美关系未来

何汉理

【编者按】 2016年3月1日下午，复旦大学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高端系列讲座迎来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先生。他以“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辩论及下一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题，向在座的复旦大学师生发表了精彩演讲，也为国内学界更好地了解当前美国国内对华政策思潮及动向提供了丰富而全面的信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管理委员会执行主任吴心伯教授主持讲座，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师及学生80余人参加了此次学术讲座。

一、美国对中国的“担忧”

2014年以来，美国的专家学者、智库研究人员、政府前政要及记者发表了很多关于中美关系及美国对华政策的文章、报告和论著，一个总的观点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失败了，没有实现其预期目标。这些文章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国际、国内行为变化是令人失望的，主要涉及如下几方面：

第一，对中国商业环境的担忧。尽管中国政府承诺继续推进国内经济改革及结构调整，但是美国及其他西方很多商业人士担心，中国政府现在对外国在华商业活动的政策是限制而非鼓励。尽管中美两国在就双边投资协定进行谈判，如果谈判成功，可能会部分改善上述状况，但是他们认为中国违反知识产权，偏袒本国企业；在执行反垄断法时选择性执法，更多地针对外国企业；美中商会和美国商会都在抱怨中国的投资环境，很多在华公司也报告中国的商业及投资环境在恶化。不管这些报告及抱怨是否正确，他们的报告都对美国政府的对华认知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对中国日益收紧的国内政治控制的担忧。美国很多专家学者及官员认为，尽管新一届中国政府在反腐方面有进展，但对国内的政治控制也在显著加强。美国人来华发现，即便在他们下榻的酒店，也无法浏览很多国外网页，如果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肯定不会有好的联想。对美国的商业网络进行攻击或出于战略目的而进行的网络攻击十分频繁，尽管很难确认谁是这些攻击的发起者，中国也显然不是这些攻击的唯一源头，也不论其背后是否有政府背景，但是网络攻击的确是中美关系的另一个麻烦源。

第三，中国外交更加积极主动。在主张领土及领海权益方面变得更加积极，如在东海和南海；在创建新的国际组织方面也更加积极主动，如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批评者认为，中国创建这些组织的目的就是要与美国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建的类似国际组织进行竞争。当然中国对美国的行为也很不满。不管怎么评估双方的不满，这些事实都表明，双方对对方都心存不快。

一句话，现在，大家都认为中美关系在恶化。一些著名的中美关系专家认

为，中美关系处于临界点；另一些人认为中美关系正处于灾难边缘。从根本上说，大家都认为，这种关系恶化还会继续加剧，甚至会跌入悬崖。

二、谁应为中美关系恶化承担责任？

谁应该对这种关系承担责任，大家几乎没有什么共识。有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是不正确、不公平的，是夸大其词，或仅关注地区性问题，关注细枝末节或阴暗面。有人批评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适应不够，不愿承认一个更加强大和崛起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求部分改变国际环境。他们指责美国不愿或不能接受中国的崛起。有人则批评奥巴马政府，认为他对中国不够强硬，未能应对好中国崛起的挑战。还有人批评美国太天真，认为中国在美国的慷慨帮助和支持下会变成另一个美国。另外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中国，是中国的政策在发生变化。

近年来中国的国内国际政策的确出现了变化，表现得积极主动。中国领导人认为自 2008 年以来国际权力已经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以前虚弱的中国不得不接受或忍受的政策，现在强大的中国就不会再忍受和接受了。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一直在欺骗美国（如美国国防部前官员写的一本名为《百年马拉松》的著作），鼓励美国这种想把中国变成另一个美国，或朝着美国希望看到的方向变化的天真幼稚想法。

在这些辩论中，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中国的行为是令人失望的，是我们不赞同或不喜欢的。大家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现象，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应对？

三、美国对华政策的“四要素”

我认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包含四个要素、四个方面或“四”个主题。目前美国国内的这场对华政策辩论的重点不是是否要改变、替换这些要素或主题，而是如何平衡这四个主题或要素。

这四个主题是：第一，美国一直在支持中国的发展与改革。美国政府及社

会，包括美国的大学、非营利机构、私营企业等都一直在支持中国的发展与改革。我在香港的一些中国学生认为美国一直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我对此感到十分惊讶。“还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一直在支持和协助中国的崛起吗？”不过，这些学生的看法，的确反映了中美两国非常不同的视角。直到最近，美国的态度一直都是要协助中国崛起。

第二，全面接触中国。在1995年后，早在克林顿时期，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就提出要通过全面接触中国，来解决中美之间存在的突出问题，寻求中美在地区及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对于接触这个词的翻译，中文有点困难。英文的“接触”一词涵义广泛、多元，但主要的意思就是接触、互动、希望有个积极结果。

第三，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首先是让中国成为主要的政府间及非政府间的成员，然后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利益攸关方是佐利克提出的，当然对于这个术语的翻译也是比较困难的。

第四，对冲、转向及再平衡。这是奥巴马政府2011年后开始实施的，主要是防止中国崛起的负面影响。

这四个方面，可以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要素。不同的只是不同时期，可能某个方面侧重得多一点，另一些时候另外一些方面强调得多一点。

四、美国应采取何种对华政策？

鉴于上述背景和情况，美国对华政策是否应该发生改变？如果变化，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如前所言，美国国内对于对华政策应该如何改变，并没有形成共识，大致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应该重点转向再平衡政策。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应该让再平衡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最主要特征，包括其中的军事和政治维度。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和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J. Tellis）合写的《改变美国对华战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报告就体现了这一政策取向，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没有突出对华再平衡的主旨，应该改弦易辙。不过，这两位作者都没有把这种政策称为遏制政策，而是认为应该制衡中国权力增长及积极主动的外交行为，不应该继续帮

助中国崛起。当然他们也知道，即便呼吁遏制也是无用的，因为美国国内现在不会支持类似于冷战时期对苏遏制的战略。不过，我认为，他们提出的政策中含有遏制的要素，比如他们提出在经济上要遏制中国，限制中国经济崛起，不让中国进入美国投资，永远不让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等。

第二种观点认为，不怎么极端的一派指出，美国对华政策不够妥协，美国应该在很多方面对华更为妥协。这一派提出了形形色色的与中国进行“交易”的政策建议。有的是针对某些具体问题或细枝末节的小交易，还有一些则属于大交易。如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提出美国应该放弃台湾，史文(Michael Swaine)指出美国应该放弃美国在东亚霸权的做法，以换取中国在诸多地区及全球问题上的合作。

第三种观点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奉行对华接触政策，但要加上一些“相互再保证”和“美国决心”。一些人强调中美“再保证”，但美国也需要展示决心和意志，对中国进行制衡。一些人强调接触，但不只是对话和谈话，也不赞成对中国继续援助。对华援助目前在美国国内政治中不受欢迎，有人认为中国已经不需要美国的继续援助了，继续援助的做法是极其天真和愚蠢的。有些人不再强调将中国融入的政策，因为中国基本上已经融入国际社会了。另一些人认为中美可以共同合作，在亚洲及其他地方创建一些新制度来弥补当前国际治理结构中的不足。

如果对上述三种观点进行总结，大致就是：第一，对华奉行强硬政策，主要是再平衡政策，也包含一些遏制因素；第二，对中国进行妥协，与中国做交易；第三，继续当前的对华接触政策，尽管要进行一些微调。

五、中美关系新变化和对华新认识？

中美关系非常复杂，悲观者和乐观者都能够找到需要的东西。中美在气候变化、朝核问题上，都进行了合作。特别是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的成绩与中美合作密不可分，联合国安理会最近通过的制裁朝鲜的决议也得到了中国的支持。然而，无论在气候变化，还是在朝核问题上，中美依然存在很多分歧。中

美两国对于朝鲜政权、朝鲜半岛形势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都存在诸多不同看法。

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也出现了诸多消极状况。如美国对中国在南海岛礁的继续军事化感到不安，中国对美国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行动也十分不快。此外，美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对待不同政见者及非政府组织的态度，日益紧缩的网络政策，对香港加强控制，以及对中国经济是否出了问题及其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影响等等，都感到忧虑。

这些问题无疑会影响到美国国内当前的对华政策辩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首先，人权问题重新抬头。有段时间，美国国内有人认为，不要再谈论人权问题了，美国没有多少影响手段，空谈人权和进行制裁都没有什么用。现在，人们又开始关注人权问题了，人权问题重新回归议程。

其次，关于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虚弱性的讨论重新复活。1989年政治风波后，美国一度热衷讨论中国的“崩溃问题”。此后，美国又认为，中国不会崩溃，活得好好的。但是，现在关于“中国崩溃”的观点又回潮了。沈大伟和裴敏欣等人在著作中都认为，按照当前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的时间不多了，难以为继，肯定要发生变化，唯一的问题是将如何发生变化，以及要多久才会发生变化。

六、美国公共舆论与对华认知

尽管美国国内对华政策辩论如火如荼，政策圈对中国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但有趣的是，长期来看，美国公众对华态度在某种程度上相当具有连贯性。盖洛普在其长期进行的舆论调查中，在涉及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方面，最大转折点是1989年政治风波。在一个月之内，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积极印象由74%急剧下降为32%。从那以后，尽管中美关系起起伏伏，但是公众对中国的印象基本稳定。发生变化的是回答对中国没有任何印象（不知道中国）的比例在减少。同时，对中国持负面印象的比例也在小幅上升。但总体趋势相当稳定。民调还显示，相对于老人，年轻人对华印象相对比较好，这与中国人对美印象态度的群体也大体类似。不知道这仅仅是代际差异，还是因为年龄不同而导致的不同。

皮尤调查主要涉及如何看待中美之间的关系，即认为中美是朋友、敌人还是其他。调查显示，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敌人的比例低，而且基本上比例保持稳定，甚至在2002年后这一比例在微弱下降，从14%下降到12%。公众这一态度与专家学者认为2008年后中国外交变得更加积极主动的认知有所不同。可能是更多的美国人认为伊朗、朝鲜、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敌人。44%认为中国友好，但不是盟友。也就是说对中国的态度复杂、模棱两可。日益增加的少数则认为，中国是敌人或不友善国家，但这也是个很大的比例，因为对中国没有印象或不持观点的人的比例在下降。

上述两个民调的总体趋势是，美国人需要很长时间才会作出判断或才会注意到中国，但是一旦他们这样做了，很可能他们的对华负面印象要大于正面印象。不过，这还没到令人紧张的程度。

七、美国总统选举与中美关系未来

到目前为止，对华政策辩论在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不占重要地位，甚至还没有怎么显示出来。当然，目前只是总统初选阶段，还没有到达政策辩论阶段，只是政策姿态阶段。而且，外交政策在大选中本来就不太重要。在当前的外交政策问题中，叙利亚、伊拉克、“伊斯兰国”、俄罗斯等问题要突出得多、紧迫得多，中国因此也不会太显著。

辩论不是讨论复杂、细微政策立场的好地方，也不是形成政策的好方式，只能起到表态作用，特别是涉及中国政策问题。目前，特朗普、克鲁兹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政策或建议问题，但并没有明确的政策。在总统候选人中，罗比奥发布了可能最为全面的中国政策。尽管这也仅是一般性的陈述，但却能够反映美国政策圈的对华政策基本取向。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他将在力量和榜样的基础上与中国打交道，而不是在虚弱和绥靖的基础上与中国打交道。他认为，奥巴马是在继续“绥靖”中国领导人。他的这段中国政策发言基本上反映了目前美国对华政策判断的基本共识，即先前的对华政策太妥协了，对华接触政策太天真了，没有对中国作出强硬反应。

希拉里·克林顿还没有就中国政策发表重大声明。不过，她认为再平衡政

策是她任国务卿时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所以，如果她当选，不会说再平衡政策是个坏主意，她会继续这一政策并加以强调。有趣的是，她谈到了 TPP。她和桑德斯都反对 TPP，尽管两者立场天壤之别，特朗普也反对 TPP。但是共和党的科鲁兹和罗比奥支持 TPP。

基本上来说，所有总统候选人都支持对华强硬，尽管他们对于 TPP 的立场不同。没有哪位总统候选人支持对华妥协立场。特朗普是个强硬的家伙，是个善于讨价还价的家伙。罗比奥也会在（美国）强大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致力于重新激活美国经济和政治制度。

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无论谁当选，可能都意味着中国作为建设性伙伴或习近平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识的终结。根本上来说，中美关系已经变得十分具有竞争性。问题是，如何管理这种竞争性的关系？有趣的是，在美国看来，竞争并不总是坏事。在经济领域，竞争是个好事，垄断是不好的。在政治领域，美国也相信竞争。只有在安全及战略方面的竞争是危险的，也是代价高昂的。

八、寄语中美关系

如果中美成为竞争者，我希望中美能够找到将竞争限制在健康领域的方法，并找到能够将受益最大化同时最低限度减少竞争损失的规则和原则。

在近年来美国出版的涉及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论著中，我最喜欢的还是斯坦伯格与欧汉伦合著的《战略再保证与决心：21 世纪的美中关系》一书，即基本上是继续保持当前政策，一方面对中国进行再保证，但另一方面觉得需要批评、阻止中国时，我们就要展示决心。不过，再保证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作两点调整。首先，再保证或者建立信任，需要选择性地妥协。但问题是，如果只是强调对话、交流及提高透明度，那么还是远远不够的。信任只能通过代价高昂的再保证才能建立起来。不只是空谈，而是要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这意味着美国需要通过选择性的对华妥协，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上进行妥协，来向中国表示美国寻求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其次，决心意味着要同时恢复美国的国内经济和政治活力。现在美国的经济有所起色，但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政治内斗依然十分厉害，束缚了政治活力，需要重

新激活。最后，再保证和决心需要合作。双方需要在重大问题上进行合作，分担风险，共担责任，共享成果。这当然需要双方的讨价还价，是一种讨价还价和竞争性的关系，但着眼点还是合作。

这是一个巨变和复杂的世界，中美都是利益攸关方，必须加强合作。中美关系存在很多问题，或许处于悬崖边缘。当前美国对华更加怀疑，更加强硬，认为中美关系本质上是竞争性关系。但是中美关系还是有弹性的。我们要学会如何管理好中美之间的竞争，使之成为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而非消极因素。

(韦宗友记录整理、吴心伯校订)

中美关系

美国基督教对华传教与 民国时期中美关系

涂怡超*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基督教是中美两国交流的重要渠道，美国基督教会的在华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基督教会大力支持中国抗日事业，并积极进行人道主义救助、影响美国大众舆论、进行直接政治游说，推动美国社会和政府支持中国。解放战争期间，教会对国共双方均有批评和支持。由于美国政治体制的约束和美国教会的分散性，美国基督教对民国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直接影响有限。

【关键词】 基督教 美国 民国 中美关系

* 涂怡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民国初期，基督教在中国正式传教已有六十多年，西方对华传教日益体系化，来华传教士及建立的教会遍布全国各地，对中国城市乡村影响不断加深。

一、民国时期美国基督教对华传教的曲折发展

（一）美国教界与世界基督教网络和中国基督教网络的成型与发展

随着基督教海外传教事业的不断扩展，各宗派所属差会独立支持各类基督教机构，彼此之间少有合作的格局已不符合传教事工发展的实际需要。自19世纪末以来，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抗争风起云涌，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牵涉甚多的基督教传教运动亦因此受到冲击，传教运动需要达成理念和行动的重整。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基督教会在美国摆脱殖民主义、形成新兴国家认同中曾发挥特殊作用。在应对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高涨、殖民主义风雨飘摇这一时代的挑战中，北美教界为世界基督教在新形势下发展作出了贡献。1907年，北美海外宣教会议（The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召开，穆德等极力倡议召开一次世界性宣教大会。在穆德等人的积极推动下，1910年在爱丁堡召开普世宣教大会，来自世界159个新教团体的1200多名代表与会。此次会议不仅是一次世界传教理念、组织网络更新整合的大会，而且标志着美国教会在海外传教方面从欧洲教会手中接过领导权。此次大会面对传教运动面临的内外挑战，认识到“各差会单独活动能够完成宣教使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决定努力达成各宗派和差会在传教地区的合作，大家相互尊重、共同合作，促进教会的合一见证，并探讨了所面临困难的解决路径。为促进普世合一，会议还组建了续行委员会，由穆德任主席，诚静怡成为该委员会的第一位中国籍委员。

会后穆德开始到世界各地推进差传合一事业。1913年1—3月，穆德访华，在中国大力推广和落实普世宣教会议的精神。他先后访问了广州、上海、济南、北京和汉口，主持召开了五次地区会议，并于3月11日至14日主持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依据爱丁堡会议的模式选举组织了涵盖各教派和差会的中华续行委员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从组织和机制上进一步推动差会与教会

在中国的合一以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华续行委办会共召开九次年会，组织多个特委会。该会重视对中国基督教及社会现状的调查，借此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基督化的重要参考，这一符合全体差会和教会意愿的目标获得了大家的普遍支持。续行委办会集全国差会和教会之力对中国基督教和中国社会现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通过这一调查进一步推动了各教派和差会的合作。调查成果最后汇集成册，于1922年出版，书名为《中华归主》。^①为了推行“中华归主”的目标并且与“中华归主”调查相呼应，1919年，中华续行委办会又在上海正式发起了“中华归主运动”，提出提高信徒的文化水平，实践远方布道，改良中国社会，开展全国性的布道运动等等。

1922年5月2日至11日，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召开，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成立，取代了已达成历史使命的续行委办会。一系列的会议与后续行动有效地促进了中国教会的合一和本色教会的迅猛发展。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之后在华新教各差会开始逐步响应会议合一及使年轻教会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的号召而更名“中华”某教会，并逐步重视培养中国本土传教人员及教会领袖。^②然而，这一进程仍显缓慢，美国有学者对此评论道：“传教士和受圣餐者的人数增加了，更多的华人被吸收为教会的领导，教育和医药服务的质量有了提高。但是在1922年后的25年，大多数基督教传教士的外国在华机构的成分，与20世纪的头20年的情况相比，在性质上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③整个民国期间，提供给教会正常发展的时期有限，大部分时期中国都在炮火中挣扎，中国基督徒在这种情势下一直努力达成基督教会本色化。在民国特殊的国内环境和国际处境下，中国教会从思想上到组织上都难以改变由西教会主导的局面。但是，在民族主义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勃兴的潮流下，放弃公开敌视中国传统文化、轻视中国教会本色化的政策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且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基督教

①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修订版）（上、下卷），蔡咏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原版于1922年出版。

② 关于爱丁堡教会与中国教会发展，可参见尹明亮：《爱丁堡会议与中国教会》，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③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杨品泉等译，谢亮生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在华传教的阻力。

(二) 美国基督教在华事工的深入发展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随后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二条第七项载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并保障人民有信教的自由权利。此后，北洋军阀政府的宗教政策不断调整，到后期逐渐宽松。1927年，蒋介石执政后扫除国民党内的激进分子和共产党，“非基运动进入尾声”。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寺庙管理条例》，1930年颁布《监督寺庙条例》，民国时期政教关系完成了从政府管理宗教组织到监督宗教组织的重大转变。

美国传教士敏锐地意识辛亥革命和随后民国的建立是基督教发展的新机遇期。美国的国势日盛，美国社会对海外传教的热忱和各项支持与日俱增，洛克菲勒等商业家族通过海外商业机构为传教提供多种便利，美国政府尽管并不经援海外传教，但亦通过保护传教、利用外交渠道便利美国教会在外活动等方式支持海外传教。1910年爱丁堡普世宣教会议后民国很快代清而立，当时正值美国基督教界自1886年开始进行的学生志愿运动发展到高峰时期。^①在中美当时的格局下，美国教会甚至将20世纪的第一个20年称为中国基督教发展的黄金时期。国民党执政后政府对外国人和基督教的态度也有变化，一些政府官员是基督徒或毕业于教会学校，对基督教抱有好感。国民党多个家族信奉基督教，其中宋氏家族与美国教会系统联系尤为丰富，蒋介石本人亦于1930年于上海在美南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所属的景林堂受洗成为基督徒。尽管国民党内曾有部分成员积极参与“非基运动”，国民政府于1927年开展了一系列收回教育权活动，缩小了差会的办学空间和教学自主权，并对私立学校的宗教教育进行

^① 如纽约协和神学院教授科芬1916年访华时携有美国前总统（时任耶鲁大学宪法学教授）威廉·H.塔夫脱（William H. Taft）给袁世凯的亲笔介绍信，1921年富司迪应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组织之邀访华，此行得到其老友小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之赞助，并携有小洛克菲勒给旗下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在远东机构的介绍信。徐以骅：《纽约协和神学院与中国教会》，载《美国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第398页。

了严格限制，但同时国民政府又在参与社会建设方面为教会打开了窗口，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等美国传教士影响巨大的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建设。

民国初立至抗日战争之前，入华美国传教士数量总体而言持续增多。“1905年，外国力量的一半是英帝国的（包括大不列颠、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3是美国的，其余的来自欧洲大陆。到1920年，英帝国和美国所占的比率颠倒，美国此时占新教传教士的一半。”^①1926—1927年，由于北伐战争的影响，大量传教士撤出中国，随着南京政权的稳定，美国传教士很快回流。

美国差会主导的教育、医疗、慈善事业在华进一步铺开，民国期间在西方差会中首屈一指。1867年美国美以美会国外传教总会（The General Board Foreign Mission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至江西传教，在民国期间辖区不断扩大。“为更好地传教，采取了教、学、医三管齐下的传教策略，即教会为学校、医院提供经费，学校为教会、医院培养人才，医院为教会、学校扩大影响。”^②美国多个差会在内地省份的传教体现出此类态势。至20世纪30年代，教会大学和国立大学的总体教学水平已各有千秋。对华传教的美国差会对教育医疗事业非常重视，源于英国、之后相当比例的传教士来自美国的内地会所雇中国员工的66%从事福音宣讲工作，30%从事教育，4%从事医药工作；而与之相比，美国海外布道会的比例为28%从事福音宣讲工作，64%从事教育，8%从事医药工作。^③总体而言，自由派的美国传教士主要分布在各类教育、出版、医疗等间接传教机构。民国以后，教会系统开办的庞大教育体系令当时的民族主义者担忧。1921年，北美国外传教会议顾问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f Reference and Counsel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受中国基督教教育会邀请，派遣一个以芝加哥大学伯顿（E.D.Burton）教授为团长的庞大的教育调查团来华，全面检讨在华的传教教育事业，调研结果《基督教教育在中国》一书于1922年发表。该报告建议将全国各级的传教学校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同时制定学校分布的全国性计划，提出由一个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

^① [美]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第189页。

^② 黄志繁、周伟华：《近代基督教新教江西美以美会研究》，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第101页。

^③ [美]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第192页。

管理所有传教学校。这引起民族主义者对教会危害中国教育主权的高度戒备，并因此进一步推动了“非基运动”的发展。

民国以后，美国成为中国神学生海外求学的最主要国家。其中纽约协和神学院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七大海外传教培训中心之一，所培养的一些赴华传教士在民国期间中国基督教会中位置显要，曾在协和学习访问过的中国教会人士亦在中国教会的本色化中发挥了重要影响。美国差会和在中国办的各级神学教育在国内的神学教育中亦居于领先地位。

美国基督教界亦将风行美国的新型布道方式输入中国。穆德、艾迪等著名布道家将大型布道会引入中国。1915年和1918年，时任基督教青年会东亚巡回干事的艾迪两度来华，在北京、保定、武昌、长沙、苏州、杭州、福州、厦门、广州、香港、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开布道会，听道者共计数十万之众。同时美国基督教的一些新兴宗派亦开始对华传教，其中基督教安息日会、神召会在华的传教扩展尤为迅速。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美之间宗教交流日益增多，美国基督教现代派和基要派之间日益激化的争端也通过各类对华交流输入中国，令中国教会中两派的争执时有加剧。^①

美国新教对中国传教的热情亦令罗马教廷感受到巨大的挑战。罗马教廷对生活在新教徒之中的美国天主教会一向持有猜疑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令罗马教廷将美国教会作为因战争而匮乏的欧洲教会海外传教的后备力量。“很多美国天主教徒因对罗马教廷而言不足以称其为天主教徒、和对美国新教徒来说因他们的天主教信仰而不足以称其为美国人的双重束缚而受折磨”，1911年，美国天主教第一个外方传教会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又译“美国天主教传教会”，Maryknoll Fathers or 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 M.M.）由于这种紧张关系而在纽约州成立。^②1918年末，波拉斯（Thomas Frederick Price）、华理柱（James Edward Walsh）、福尔德（Francis Xavier Ford）及马奕猷（Bernard

^① Xiyi Yao, *The Fundamentalist Movement among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920—1937*,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3.

^② Thomas A. Breslin, *China, American Catholicism, and the Missionary*,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23.

F.Meyer) 等 4 位玛利诺神父到达广东阳江, 这是美国修会首批来华天主教传教士。此后, 玛利诺外方传教会从欧洲教会手中陆续接管了 5 个教区, 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长最快的一个在华天主教教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教廷赋予富裕的美国天主教会更多使命。美国著名的“反共”人士、时任纽约主教的史贝尔曼 (Francis Spellman) 枢机 1946 年曾来华安排战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复兴计划, 并陪同中国第一位红衣主教田耕莘去罗马接受教宗祝圣。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削弱了欧洲修会在华事工的力量, 战后美国修会在华事工持续增长, 不断渗透至上海这类法国耶稣会的传统据点。

这段时间内美国对华传教所遇到的最大阻碍为战争。1927 年的北伐战争令传教士纷纷撤出中国, 之后的抗日战争对传教事业影响极大。1937 年, 在华美国传教士约有 2 200 人 (包括传教士之妻, 她们一般亦服务教会), 到 1945 年初, 只剩 243 人。^①其中一些在敌占区的美国传教士及其家属在“珍珠港事件”后被集中关押在集中营, 包括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

1944 年, 在战争胜利曙光初现之时, 美国基督教界即开始进行差会的复员部署, 北美宣教协会事工设计委员会在纽约举行特别会议, 制定“战后中国教会有关各类问题”文件, 之后复员工作密切配合时局变化而展开, 同时与国民党政府展开多种合作, “中国政府已派交美国援华会和教会亚洲救济委员会一个庞大的任务, 来执行中国全国范围内的救济与复员工作”^②。抗日战争之后, 传教界认为基督教经过战争洗礼, 在服务国家、基督徒领导能力及基督教界合作方面都有了进步, 一度对中国基督教界的发展充满希望。^③基督教组织与国务院等部门密切联系, 确保传教士迅速来华, 尤其是“那些能运作救援和医院事宜的传教士”^④。1945 年至 1948 年, 几乎每条来上海的轮船上都载有传教士。1946 年 9 月, 有一艘从美国来的轮船上就载有传教士 408 人。1947 年底, 中国

① J.W.Decker,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Far Eastern Survey*, Vol.15, No.4 (Feb.27, 1946), pp.57—61.

② 曹圣洁:《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时期的外国差会和传教士》, 罗冠宗主编:《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51—354 页。

③ J.W.Decker,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pp.57—61.

④ T.F.Tsiang (Director General, CNRRA) to Dr.Robert T.Henry (American Advisory Committee), May 15, 1946, BGCA CN165, Box1, Folder 4.